

中国山水画通鉴

超以象外

上海书画出版社

文同 苏轼 李公麟 米芾 米友仁 乔仲常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超以象外

CHINA CORRESPONDENCE UNIVERSITY OF DISTANCE EDUCATIO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以象外 / 胡建君撰文. —上海: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6. 1

(中国山水画通鉴)

ISBN 7-80725-276-6

I. 超… II. 胡… III. 山水画—艺术评论—中
国—北宋 IV. J21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 142430 号

责任编辑: 王 彬

技术编辑: 杨关麟

责任校对: 周倩芸

版式设计: 杨关麟

封面设计: 王 峥

中国山水画通鉴·超以象外

② **上海书画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邮编: 200050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online.sh.cn

上海文高制版有限公司制版

上海丽佳彩色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965 × 635 1/16

印张: 7 印数: 1-3,000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25-276-6/J.260

定价: 30.00 元

中国山水画通鉴

超以象外

文 胡建君

前言

山水画是中华文明的独特产物。千余年来，它作为中国绘画的最大门类及其艺术成就的集中体现，作为中国人观照自然、阐释世界和承载其观念意义的一种重要方式，以鲜明的文化品格、丰富的表现形态，参与了中华民族艺术精神和人文气象的建构。20世纪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山水画的文化渗透力尽管有所削弱，但为其提供并不断滋养着后来人的价值和形式渊薮，仍然以其既作用于现实艺术情境，又作用于主体认知结构的双重效应，深深楔入当今时代。

《中国山水画通鉴》以图文相映的方式，对这部绚丽多姿的山水画发展史进行了较为完整而系统的梳理。从中展现的，不仅是山水画的发生发展过程，不仅是关乎山水画的艺术家和艺术作品的流衍变迁轨迹，而且也牵连了山水画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牵连了一代又一代需要山水画的人与山水画所构成的那层不断嬗变着的微妙关系。

为了方便阅读和使用，全书以山水画发展的时序为经，以价值形态的消长变化为纬，厘定成三十四分册，每册皆独立成章而又互为生发呼应。本书《超以象外》为第五册，主要阐述北宋文人画家的艺术主张及其山水画创作。

目录

- 一 杯酒释兵权 6
- 二 归根复命 13
- 三 依仁游艺 自适其志 23
- 四 丹青弄笔聊尔耳 33
- 五 水墨自与诗争妍 51
- 六 忘形得意 反常得理 79
- 七 萧散简远 平淡天真 95
- 八 款题图画 画中有诗 107

杯酒释兵权

如果说唐代之前是以戎马天下的“武功”彪炳史册，那么北宋便是以崇文抑武的“文治”安邦治世，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北宋在对外关系上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屈辱局面，北敝于辽，西困于夏，再迫于金，进而流弊百年，积弱不振。在外辱纷繁的同时内阍不绝，新旧两党的争斗此起彼伏。自北宋中叶以后，随着王安石变法失败而酿成的党祸，更使“百年无事”的承平繁华再难掩盖“暗流激涌”的内忧外患，凡此种种给北宋文人士大夫的心理造成了巨大压力。“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既失意于时，满腹不合时宜的牢骚，溢而为诗画，引发了文人画思潮的兴起。“吾儒者粗识去就，性爱山林”，文人士大夫与质有而趣灵的山水最为神情亲密，他们“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以独往”，进而笔走龙蛇、卧游山水实现其远蹈高引、离尘绝俗的心愿。

在中国绘画史上，以文人意趣入山水之画源远流长，如南朝之宗炳、王微，唐之卢鸿、王维、张璪，五代之荆浩、关仝、李成等人的山水画，诗趣相属，胸臆盎然。然而，做到有效地表达这种情感内容却是从北宋中

期以后开始的。北宋中期山水画的这种变革在其自身发展历史上,可谓孤标高致,意义深远,其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实属空前。不但专业画家如李公麟、王诜等人参与其事,热于实践;即便是业余画家,如苏轼、米芾等,也摇旗呐喊,勇于探索。其中,苏东坡因其在文学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俨然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

李公麟本为道释人物画大家,然而在山水画上,也有不俗的表现。他成功地对吴道子画风进行改造,开创小幅面卷轴白描的样式,使得绘画由面向大众的传播教化工具变为文人士夫吟咏性情的寄托载体成为可能。其笔下山水不施丹青而光彩照人,成为宋代文人士夫所独有的温文尔雅的心境写照形式。而诗人艺术家苏轼则高举文人画理论的大旗,尤其令人瞩目,以他和文同为代表,将山水画中枯木竹石等题材独立出来,或有心或无意,赋予其新的涵义和形式,与传统的正规画风尤其是宫廷画院的画风判然相别,戛戛独造。稍后,另一种以“墨戏”为标帜的“二米”水墨云



李公麟 五马图卷(局部)

山画亦脱颖而出，两者身先士卒、齐心协力，并王诜、晁补之、乔仲常、司马槐等人，在文人正规画抑或文人墨戏画领域，在中国山水画的风格嬗变史上，继卷轴画取代壁画之后，建立起又一座云表奇峰般具有转换意义的里程碑。

在中国历史上，两宋的文官制度颇为宽松。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恐后来将帅步其后尘，遂于登基之后，采用宰相赵普建议，“杯酒释兵权”，由此武将的地位日见没落。其后，为革除将领骄横不羁、专权跋扈的风气，又实行以文人知军事的制度。同时遣文官百多人充当武将，主持地方军事乃至对外作战。所以，有宋一代，武官势力的没落，致使文官权利日益扩张。与此同时，为了扭转五代重武轻文的风气，实施了优礼士大夫的政策，并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于选拔官吏时，亦大都以文学之士为主，结



马远 西园雅集图卷（局部）





马远 西园雅集图卷 (局部)



陈洪绶 华岳 西园雅集图卷（局部）

果令读书风气越加昌盛，造成文人地位日隆。宋代文治局面的出现，更助长了文学艺术的发展。

与此同时，宋朝的官员数量比前朝大为增多。一是由于宋代采用集权中央的政策，故于中央内增设不少行政机关及职位，以致政府部门重重相叠，官吏人数大增。另外，宋太宗亦将“恩荫”入仕的条例扩宽，每年多达数百人循此入仕。加上宋代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历世皆优礼士大夫，所以士人出身极易，进士一登第即可授官。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职大臣没有遭到屠戮的极少数朝代，有人触怒龙颜权贵，至多贬到边远地区，还有了苏东坡“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口福。他们待遇稳定，官员们每月有制度化的伙食补贴，甚至另有交际费。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到的滕子京，即因涉嫌公款吃喝而被贬。

北宋文官数量增多，不像唐朝的文官那般忙碌，同时待遇相对优厚，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和时间交游雅集，诗画酬唱，不下堂筵，坐穷泉壑。虽然文人雅集之韵事，古已有之，但宋代文人聚会之盛大、频繁，令以前任何时代都为之逊色。随着文人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们对时尚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进而文人群体活动的自觉意识也随之增强。特别是元祐时期，苏轼的文坛领袖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以“苏门四学士”为主的一大批文人才士齐聚京城，在苏轼的倡导之下，文学艺术活动空前繁荣，文人的创造性被激发出来，出现了文艺的全面繁荣，取得了宋代文学艺术的最高成就。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绘画的发展也到了—一个关键时期，更在苏轼等人的影响下，文人为画逐渐成为时尚，而文人画也在中国绘画史上开始占有其显要的地位。

与苏轼同时代或稍前稍后的著名文人欧阳修、黄庭坚、晁补之、米芾、陈师道、沈括等，对于绘画都抱有极大的兴趣，并不时发表各种见解。而当时许多画家包括著名的画竹名手文同、人物画巨擘李公麟、山水画大家王诜等，都与苏轼交往密切。苏轼经常与之聚会，为他们题画，闲来弄笔作竹石，挥毫落纸若云烟，或—寄诗情，或—发块垒。著名的“西园雅集”，就是当时苏轼与米芾、黄庭坚、李公麟、晁补之、张耒等人在宋英宗驸马王诜家的西园中的一次风云际会。西园雅集，不单是一次文人的诗画聚会，它体现了宋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宋代士大夫的一种时尚，甚至成为宋代文化生成的一种特征。据记载，李公麟曾专为此盛会画了《西园雅集图》，用写实的方式描绘十六位文人雅士在王诜府邸挥毫用墨、吟诗赋词、抚琴唱和、打坐问禅，衣着得体，动静自然，书童侍女举止斯文，落落大方，不仅表现出不同阶层人物的共同特点，还画出了尊卑



陈洪绶 华岳 西园雅集图卷（局部）

贵贱不同人物的个性和情态。现在我们从南宋马远和明代陈洪绶所作的《西园雅集图》中，还可以窥见当初文人墨客兴会雅聚的一时之盛，他们以笔援情，酬唱相和，在纸香墨飞中抒写或忧或喜的心意。于是，在苏轼、米芾等一批文人学士的互相影响和推动下，注重抒发主观情致的文人画逐渐形成新的艺术潮流，与“皆从格法”的画院写实之风相互辉映，促成宋辽金时期绘画的全面发展，其影响亦绵延至今。

■ 归根复命

虽然，文人物质条件的优厚以及生活的闲适极大地促进了北宋文学艺术的繁荣，但是由于北宋实行弱干强枝的政策，也导致了积贫积弱的现实。而向来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文人们面对当朝的弊端，自然流露出了试图改变现实的政治愿望。但是，伴随他们的往往是党派之间的争斗以及文人之间的倾轧，终究是回天无力的失意与无奈。所以，在北宋文艺极大繁荣的表面下，掩盖着更多的则是失意文人的心灵苦闷与悲怆诉求。

仁宗嘉祐末年，北宋政权的政制繁复，机构臃肿，造成了严重的冗官、冗兵、冗费现象，财政左支右绌。改革弊政，已迫在眉睫，于是出现了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王安石是一位具有敏锐洞察力的政治家，还在嘉祐三年（1058），他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尖锐指出，北宋“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制财力日以穷困，而风俗日以衰坏”。因此，必须变法。熙宁二年（1069），新继位的神宗，十分赏识王安石的“万言书”，即召其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三年又升任



赵孟頫 东坡立像图轴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轰轰烈烈的变法从此拉开了序幕。

本来就重文轻武的宋代，加之士人热衷于议论时政并以此博取个崇高名声的天性，此时由于变法的冲击，政见的不同，导致在朝野中分为新旧两派，互相争执不下，甚至意气用事。元祐初，旧党弹冠相庆，袞袞登上台阁。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比较重于保持传统，谨守祖宗成规，因而反对变法；王安石则积极推行变法，唯其个性执拗，未能与守旧派妥协，因而大量起用新人，排斥反对变法的朝臣，新旧二党互相攻讦，相互倾轧。北宋自神宗起，至徽宗为止的四五十年间，新旧两